

道器之间：事功与义理的千古对峙

朱熹与陈亮 王霸义利之辩 研究

章锦水

南宋中期，程朱理学已从民间思潮升格为支配士林的主流意识形态，以“正心诚意、存理灭欲”为标识的性理之学，既塑造了道德标高，也催生了空疏浮泛的士风。面对危局，永康的陈亮挺身而出，以事功为刃，向理学教条发起系统批判。他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书信为战场，就政治法则、历史评判、价值标准、人格理想展开不留余地的思想对决，史称“王霸义利之辩”。

这场辩论始于淳熙壬寅（1182年），盛于甲辰、乙巳（1184—1185），前后往复数十通，言辞恳切而锋芒毕露。朱熹以道德纯粹性为最高尺度，要陈亮“继去义利双行、王霸并用之说”，退守醇儒修身；陈亮则以国家治乱、生民休戚、功业成败为尺度，反诘朱熹割裂历史、空言性命、漠视现实。二人同为儒者，同怀忧世之心，却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路径：朱熹要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道，以道德重构秩序；陈亮要为国纾难、建功立业，以事功践行道义。

朱陈之辩不仅是南宋思想的分水岭，更构成中国政治哲学与伦理思想的永恒母题。后世或以朱为正、或以陈为实，实则二者互补共生。本文立足《陈亮集》《朱子文集》原始书信，结合陈亮思想从军事策论到政治革新再到哲学批判的三阶段进阶，对这场千古辩难做深度文本解读与理论重构，还原其思想原貌与时代精神。

一、辩论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缘起

（一）南宋的时代困境：偏安与恢复的尖锐冲突

北宋灭亡、南宋偏安，构成朱陈之辩最直接的历史场域。朝廷上下以“和议”苟安，士大夫沉溺于心性空谈，对君父之仇、疆域之耻麻木不仁。陈亮在《上孝宗皇帝第一书》中痛斥：“始悟今日之儒士，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，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。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，而低头拱手以谈性命，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！”这一判断，直指理学在现实政治中的功能性失效。

朱熹并非不主张恢复，但他将恢复之根本归于君主心术纯正、天理流行，认为政治失败源于道德堕落；陈亮则认为，道德不能脱离事功，恢复大业必须有富强之实、权谋之略、举措之当，空谈心性只会延误国事。同一种忧患，导出两种救治方案，辩论由此不可避免。

（二）陈亮思想的三阶段进阶

陈亮的批判并非一时意气，而是历经长期思考的成熟体系：

1. 初期：军事视角。青年时期，陈亮作《酌古论》21篇，考古人用兵成败，聚焦战术得失，将战败归于军事处置不当。

2. 中期：政治转向。随着社会阅历加深，他五上孝宗书，从军事反思转向制度批判，提出变革吏治、裁抑冗滥、富国强兵的整体方案。

3. 成熟期：哲学批判。针对理学的主流影响，他以事功主义解构理学唯心主义，建立永康学派，与朱熹正面论战，从本体论、历史观、价值观层面完成对理学的系统回应。

这一进阶，使陈亮从民间谋士

升华为思想家，其对朱熹的批判，不再是具体政见之争，而是哲学根基之争。

（三）辩论的直接触发：书信往复与立场摊牌

吕祖谦去世后，陈亮成为浙东事功之学的旗帜，朱熹深感浙学专是功利，此意甚可忧。朱熹在信中明确要求陈亮放弃“义利双行、王霸并用”，皈依醇儒之道；陈亮接连以《壬寅答朱元晦秘书》《又甲辰秋书》《又乙巳秋书》反击，辩论全面爆发。双方皆以“明道救世”自命，却在“何为道、如何行道”上截然对立。

二、朱陈之辩的核心分歧：本体、历史、政治、价值四重对峙

（一）本体论对立：道在物先VS道在事中

朱熹的哲学核心是理本论：理在先，气在后，道非出于形气之中，而超乎形气之上，天理是先验、永恒、绝对的本体，现实事物只是天理的流行发用。落实到政治，便是“道统”超越历史，三代圣人传心法，后世帝王偏离道统。

陈亮坚持唯物立场：夫盈宇宙者，无非物；日用之间，无非事。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，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。道不在虚无缥缈的本体界，而在民生日用、政治举措、历史实践之中。道不能舍人而存，不能脱离人类活动成为悬空之物。他直言：“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，则舍人可以为道，而释氏之言不诬矣。他反对把道说得“太深奥与玄乎”，反对与人无关，与事功无关，反对佛家认为的道在人心之外、世界之外。这一批判，击中朱熹将道神秘化、先验化的要害。

针对朱熹“理一分殊”，陈亮以人身为喻：“耳目口鼻、肢体脉络各司其职，一体俱化，一处有阙则全体不完。理一是整体之理，分殊是具体事物之功能与法则，理不离物，殊不离一，从根本上否定了‘悬于物外之理’。

（二）历史观对立：三代汉唐两截论VS古今一道不息论

朱熹以天理人欲划分历史：

三代以上：帝王心术纯乎天理，行王道，是义、是公、是盛世；

三代以下：汉唐之君，无一念不出于人欲，行霸道，是利、是私、是衰世。

在朱熹笔下，千五百年历史成一大空缺，道统几乎中断，唯有儒者守其道以待后圣。这是典型的历史倒退论。

陈亮以历史事实痛加驳斥：

第一，道不可息，亦不可离人。若道在汉唐中断，那么千五百年，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？天地不曾塌，人物赖以生息，必有道在其中运行。

第二，汉唐功业，即是大德。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，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，而人物赖以生息，能统一、能安定、能养民，便是大功德，便是道之体现。

第三，王霸本无绝对鸿沟。谓之杂霸者，其道固本于王也，霸道之中自有王道精神，王道亦需霸道手段以成事。

陈亮彻底打破“三代完美、汉唐黑暗”的虚构，确立历史连续论、进步

论，将历史评价从动机伦理拉回效果伦理。

（三）政治哲学对立：崇王黜霸VS王霸并用

朱熹坚守孟子传统，严辨王霸、尊王贱霸：“王道以天理为本，以德化人；霸道以智力把持，以利驱人。政治的首要任务是‘正君心’，君心正则天理行，天下自定。他反对任何功利取向，认为富强之术会败坏道德根基。

陈亮提出王霸并用、本末兼赅：“王道是理想与价值，霸道是手段与能力；

无王道则霸道失其正当，无霸道则王道流于空言；

治国必须‘顺民之心’，因时制宜，道德教化与法度权谋不可偏废。

陈亮并非否定王道，而是反对把王道抽象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教条。他要的是能落地、能救国、能安民的政治，而非书斋里完美无瑕的政治。

（四）价值论对立：存理灭欲VS义利双行

这是辩论最尖锐的部分。

朱熹：“义利不两立，天理人欲不并存。义是天理，利是人欲；存天理则必须灭人欲，君子谋道不谋食。

功有适成，何必有德；事有偶济，何必有理。陈傅良对朱子学说给了如此评价。

陈亮：“义利统一，理欲同存。

物质欲望是人之天性，不可禁、不可灭，只能‘因其欲恶而为之节’；义不在利之外，而在利之公、利之正、利之善。

他反问：“禹无功，何以成六府？乾无利，何以具四德？否定事功与功利，便是否定圣人成事之基。陈亮的‘利’，绝非一己私利，而是生民之利、国家之利、天下公利。

功到成处，便是有德；事到济处，便是有理。陈傅良对陈亮学说的评价较为中肯与精准。

（五）人格理想对立：醇儒VS成人

朱熹要陈亮做醇儒：“闭门修身、惩忿窒欲、迁善改过，以道德纯粹为最高人格。

陈亮拒绝做枯木死灰式的腐儒，主张做成人：“学者，学为成人，而儒者门户之大者耳。成人须有才、有胆、有识、有功、有德，能担当、能任事、能救世。他嘲讽理学人格：“得之浅者，不过如枯木死灰；得之深者，纵横妙用，肆而不约，皆无用之人。”

三、辩论的理论实质：两种儒学范式的根本差异

朱陈之辩，本质是儒学内部两条路线的决战：

1. 道德理想主义（朱熹）：以道德本体为中心，动机至上，修身优先，价值优先于事实，理想优先于现实，追求内在超越。

2. 现实事功主义（陈亮）：以实践效果为中心，事功优先，治国优先，事实检验价值，现实成就理想，追求经世致用。

朱熹要解决的是信仰与秩序问题：道德滑坡、人心不古、道统不继；陈亮要解决的是生存与富强问题：外敌压境、国势孱弱、空谈误国。

二人同属儒家，同尊孔孟，同讲仁义，但路径相反、标准相反、重心相反。朱熹是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立法

者，陈亮是“为当下救危亡”的行动者。

四、陈亮对理学的系统批判：从学风到政治的全面清算

陈亮的批判，覆盖理学的学风、方法论、社会功能、政治后果：

1. 空谈性命，脱离实际：玩心于无形之表，不察事物、不务实事，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。

2. 割裂道物，走向唯心：理在事先、道在物外，颠倒精神与物质关系，把道变成神秘本体。

3. 道德专制，压抑人欲：以天理压制合理欲望，违背人性，扼杀社会活力。

4. 历史虚无，贬抑事功：否定汉唐功业，美化三代，陷入复古迷梦。

5. 政治苟且，纵容随安：空谈正心诚意，掩盖制度无能，与军事软弱，为偏安提供理论掩护。

陈亮明确宣告治学宗旨：“正欲揽金银铜铁铸作一器，要以适用为主耳。不拘门户、不立壁垒，唯实用是从，这是事功之学最鲜明的底色。”

五、朱陈之辩的思想史地位与现代价值

（一）思想史地位

1. 南宋思想的双峰对峙：朱熹理学建构了最完备的道德形而上学，陈亮事功之学代表了中国古代最彻底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。

2. 纠正理学空疏之弊：朱陈之辩后，事功精神汇入浙学传统，成为明清实学的先声。

3. 塑造中国政治智慧的双重基因：后世治世，无不兼采朱陈；以朱熹立道德操守、以陈亮立事功能力；以义立心，以利养民；以王道立制，以霸道行权。

（二）现代价值

1. 道德与功利的平衡：反对极端道德主义与极端功利主义，主张义利统一、公私兼顾。

2.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：陈亮“事到济处，便是有理”，与实践标准高度相通。

3. 经世致用的学风：反对空谈理论、脱离实际，强调学问要解决真实问题。

4. 历史理性与现实理性：不迷信复古，不美化过去，立足当下、解决问题、成就功业。

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，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场无输家的辩论。朱熹以天理确立道德的绝对性与崇高性，守护了文化的精神标高；陈亮以事功确立实践的必要性与有效性，守护了文化的现实生命力。一主内圣，一主外王；一重动机，一重效果；一崇理想，一崇现实；二者相反相成，共同构成完整的儒家精神。

陈亮以“道在事中、王霸并用、义利双行、功到德成”的思想，打破了理学独大的格局，为中国思想注入清醒的现实理性。这场发生于八百年多前的书信辩论，至今仍在回应我们时代的核心命题：如何在坚守价值的同时成就事业，如何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尊重现实，如何让道德不沦为空谈、让功利不沦为私欲。

道不远人，理不外事。朱陈千古辩友，相争而不相害，对立而互补，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内圣外王、义利并举、知行合一的精神原型。